
20世纪西方文论选讲

——以『语言学转向』为视域

李卫华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河北师范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20 世纪 西方 文论 选讲

——以『语言学转向』为视域

李卫华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世纪西方文论选讲/李卫华著.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7. 2

ISBN 978-7-202-04502-2

I. 2… II. 李… III. 文学理论-研究-西方国家-20世纪-高等学校-教材 IV. I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61320号

书 名 20世纪西方文论选讲
——以“语言学转向”为视域

著 者 李卫华

责任编辑 王琳

美术编辑 耿 隼

责任校对 李 耘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邮编: 050061)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30 000

版 次 2007年2月第1版 2007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300

书 号 ISBN 978-7-202-04502-2/G·1444

定 价 31.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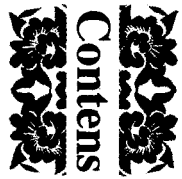


导言	(1)
第一章 表现主义	(15)
第一节 克罗齐论“艺术=直觉=表现=语言”	(15)
第二节 科林伍德论“艺术=表现=想象=语言”	(26)
第二章 象征主义	(43)
第一节 象征主义的先驱	(44)
第二节 象征主义的中坚	(54)
第三章 文学符号学	(72)
第一节 卡西尔的符号理论	(73)
第二节 苏珊·朗格的文学符号学	(83)
第四章 俄国形式主义	(93)
第一节 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总则	(93)
第二节 什克洛夫斯基与坦尼亚诺夫论“陌生化”	(98)
第三节 雅各布森论“文学性”	(111)
第五章 英美“新批评”	(125)
第一节 “新批评”的先驱	(125)
第二节 “新批评”的中坚	(139)
第三节 “新批评”的第三代批评家	(150)
第六章 结构主义	(161)
第一节 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	(161)
第二节 结构主义叙事学	(1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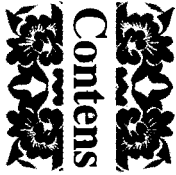


目
录

第三节 罗兰·巴特：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	(178)
第七章 解构主义 ·····	(195)
第一节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	(196)
第二节 耶鲁学派·····	(205)
第八章 存在主义 ·····	(229)
第一节 存在主义概貌·····	(229)
第二节 海德格尔论此在与诗·····	(238)
第三节 萨特论“介入文学”·····	(248)
主要参考文献 ·····	(264)
后记 ·····	(271)



Introduction	(1)
Chapter One Expressionism	(15)
1 Croce: art=intuition=expression=language	(15)
2 Collingwood: art=expression=imagination=language	(26)
Chapter Two Symbolism	(43)
1 The Pioneers	(44)
2 The Nucleus	(54)
Chapter Three Literary Semiotics	(72)
1 Cassirer's Theory of Semiotics	(73)
2 Susanne K. Langer's Literary Semiotics	(83)
Chapter Four Russian Formalism	(93)
1 The General Rules of Russian Formalism	(93)
2 Shklovsky and Tynyanov: defamiliarization	(98)
3 Jakobson: literariness	(111)
Chapter Five The New Criticism	(125)
1 The Pioneers	(125)
2 The Nucleus	(139)
3 The Third Generation of The New Criticism	(150)
Chapter Six Structuralism	(161)
1 Levi-Strauss's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161)



2	Structural narratology	(165)
3	Roland Barthes: From Structuralism to Deconstructionism	(178)
Chapter Seven Deconstructionism		(195)
1	Derrida's Theory of Deconstructionism	(196)
2	The Yale Group	(205)
Chapter Eight Existentialism		(229)
1	A General Picture of Existentialism	(229)
2	Heidegger; Dasein and Poetry	(238)
3	Sartre; Committed Writing	(248)
Bibliography		(264)
Postscript		(271)



导 言

20 世纪是一个充满动荡和突变的世纪，社会的激变导致了文化的巨大变迁。回首 20 世纪的思想文化，“转向”成为人们越来越频繁使用的一个术语，它鲜明地表征着 20 世纪文化的巨大变革。当人们用这个术语来描述 20 世纪西方文论时，意在强调它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趋势和方向。“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是 20 世纪西方文论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学术事件，本书以此为视角，试图勾勒出 20 世纪西方文论发展的粗浅轮廓。当然，以“语言学转向”为线索，并不能穷尽西方文论在 20 世纪的所有发展，这只不过是 20 世纪西方文论的一种可能的理解和解释，一种分析的参照系而已。

一、“语言学转向”的发生

“语言学转向”是 20 世纪西方文论史上的一场革命，是整个文艺理论研究范式的一种转型。这一转型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 20 世纪西方社会文化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概括起来说，至少有如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语言学的发展为文学理论的“语言学转向”提供了理论基础

20 世纪语言学发展最重大的事件是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出现。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是 20 世纪影响最大的语言学家之一，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e of General Linguistics*）为现代语言学三大结构主义学派（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和美国描写语言学）奠定了基础，他向历史比较语言学所提出的挑战被称为现代语言学中的“哥白尼式革命”。他的研究不仅对 20 世纪的语言学研究，而且对 20 世纪文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特别是对结构主义文论影响尤为深刻。

索绪尔将人类日常语言活动分为言语（parole）和语言（lan-

gue) 两个层次, 并认为语言学研究的不是个别的词句(言语), 而是使这些词句能够有意义的整个语言系统(语言)。任何人说的话不可能是全部语言, 而只能是根据这个系统的语法规则使用一些词汇构成的言语。语言和言语之间的关系是抽象规则和具体行动的关系, 具体的言语可以千差万别, 无穷多样, 但语言系统的规则却是有限的, 正是这些有限的规则使我们能够理解属于这种语言的任何一句话, 即任何言语。这一区分, 突出了语言系统的结构性质。它告诉人们, 任何具体言语都不具有独立的意义, 它们之所以能够表情达意, 都是由于那个超越其上的语言系统(结构)的作用。

在确立语言系统在语言学研究中的重要性的同时, 索绪尔进一步论述了语言符号的性质。他认为, 任何语言符号都是由概念和音响形象两部分组成的, 他把后者称为能指(signifier), 把前者称为所指(signified)。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应该说明, 索绪尔这里所说的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任意性, 是针对语言现实中能指与所指之间没有任何可论证的自然联系而言的, 强调的是最初形成时期。但是, 当一个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关系在一个语言系统中被确立以后, 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 人们便不能随意对它们的关系加以改变了。

索绪尔认为, 在语言状态中, 一切都是以关系为基础的, 这种关系表现为横组合关系(syntagmatic relationship)与纵聚合关系(paradigmatic relationship)两个向度。因此, 语言符号的意义并不是它们本身的内容所规定的, 而是在一个纵横交织的关系网中, 被语言的结构所规定的。在语言中, 任何一个要素的意义都取决于它与前后上下各要素的差异与对立, 用索绪尔的话说: “在语言里, 每项要素都由于它同其他要素对立才能有它的价值。”^① “它们的最确切的特征是, 它们不是别的东西。”^②

索绪尔的这些思想十分重要, 它告诉人们, 任何一个符号的意义, 从本质上看, 都是由它所归属的那个系统所决定的, 用索绪尔的话说就是: “语言不可能有先于语言系统而存在的观念或声音, 而只有由这系统发出的概念差别和声音差别。”^③正是由这系统发出





的概念差别和声音差别，决定了语言符号的意义。换言之，语言的意义是由语言符号的差异所决定的，没有差异就没有意义。这里所谓的“差异”，既指不同的发音和书写记号这种物质性的区别，也指互为存在前提的观念之间的区别，例如没有上即没有下，没有善即没有恶等。这便是人们通常所谓的“二项对立”（binary opposition）的原则。这一原则对后来结构主义研究有重要影响。

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兴起，当然首先造成的是语言学本身的转向。但随着其影响的不断扩大，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概念和原则，作为一种新的认知范式和方法论渗透到其他学科，被其他学科模仿，使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整个人文学科出现了“语言学转向”。

（二）哲学美学的“语言学转向”为文学理论的“语言学转向”提供了外在可能性

一般认为，20世纪西方哲学和美学有两大主潮：一个是以分析哲学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分析美学为代表的科学主义潮流；一个是以存在主义哲学及其美学为代表的人文主义潮流。这两种哲学（美学）在许多方面是彼此对立的。但是，在对语言的关注方面，两者是共同的。换言之，是两者的共同合力，促成了现代西方哲学和美学的“语言学转向”。

现代科学主义哲学认为，哲学上许多问题之所以长期争论不休，其根源就在于语言的误用，因此，对语言的分析，即正视语言的缺陷，揭示语言真实的逻辑结构，就成了哲学的首要任务。1915年，罗素在一次演讲中就宣称，以前在哲学中讨论的认识论问题，大多只是语义的问题，可以归结为语言学的问题。维也纳学派的石里克在1918年出版的《普通认识论》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见解；他在1930年发表的《哲学的转变》一文已隐含了“语言学转向”的提法。1967年，美国哲学家罗蒂编选了一部论文集，题目即为“语言学转向”，他认为，“通过改革语言，或通过进一步理解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语言，可以解决甚至排除哲学上的种种问题”。^①

经过分析，语言哲学家们提出了著名的“可证实性原则”：一个命题有无意义取决于它是否能用逻辑证明的方法或经验证实的方



法来确定其真假。换言之，只有当我们能用逻辑证明的方法或经验证实的方法，证明一个命题是真的或是假的，这个命题才是有意义的。以此为标准，传统形而上学所争论的问题，诸如世界的本原、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等等，既不能被经验证实，也不能被逻辑证明，它们无所谓真假，因而都是没有意义的“伪命题”，这些根本不是哲学所要探讨的问题。它不但不能解决哲学问题，反而导致了許多不必要的误解和混乱。相应地，在分析美学家看来，传统美学所提出的许多根本性问题本身是经不起分析的，如“美是什么”、“艺术为何”之类的问题的提出永远只是一个伪命题。它们“连错误都不是”，而“只是一无所所有”。因此，在美学中我们不应该问“美的实体或性质是什么”，而应该搞清楚“美的”这个形容词是如何被人们运用的，它的使用条件是什么，使用的方式是什么等等。如此一来，传统的美学思考方式，也就被转移到美学的语言批判上来了。

现代人文主义哲学和美学同样建立在对传统的形而上学理论的批判的基础上。从前，旧形而上学的认识论把人看成是进行认识的主体，世界万物是被认识的客体，而语言被看成是认识的工具，是人用来反映天地万物的镜子。而现代人文主义的观点与之恰恰相反。它反对人与世界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强调人与世界的浑然一体、不可分割。它使用“存在”来取代“主体”、“客体”这样的概念，因为存在的天然境界并无主客之分。而语言直接与存在相关。语言并非一件现成的工具，而是人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也并非人们为了交往而互相商量好“规则”的一种“博弈”，而是此在的存在方式。语言的本质在于理解，理解的本质则是此在在生存中对存在者的揭示，是存在者的显现，而存在者显现的方式取决于此在的在世方式。这样一来，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变成了语言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语言成了哲学和美学研究的中心。

哲学和美学的研究为文学理论提供方法论的指导，文学理论的研究必然要受到哲学和美学研究的影响。因此，20世纪西方哲学和美学的“语言学转向”，也为20世纪西方文论的“语言学转向”



提供了外在的可能性。

（三）文学实践的发展构成了 20 世纪西方文论“语言学转向”的实践基础

理论来源于实践。20 世纪西方文论的“语言学转向”，更深层的原因恐怕在于文学实践的发展。自从法国象征主义文学发端以来，20 世纪西方文学在语言革新方面的尝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象征主义诗人认为，文学艺术是彼岸理想的象征，在自然界万事万物之间，外部世界与人的精神世界之间，现实世界与超验世界之间，都存在着一种神秘的象征关系。诗人能够对这种神秘的关系心领神会，诗人的任务就在于去发现、感知和表现这种固有的象征关系和其中深藏的意蕴。因此，诗歌语言不能是明晰和易于理解的，而必须是神秘的、朦胧的和暗示的。未来主义则提倡以“自由不羁的字句”去创作，鼓吹“把词从词义中解放出来”。特别是在诗歌创作上，他们提倡打破传统的句法和韵律，随心所欲地标新立异，用一系列的“类比”、“感应”、“断断续续的想象”，表现作者神秘的感受。意识流小说着重描写人物瞬息万变的无意识活动，作家常常采取跳跃式联想、时序颠倒、梦的连锁、各种隐晦的象征暗示等手法，以突出无意识活动之繁复、错综、紊乱。有些地方甚至不用标点符号，运用怪僻奇特的新词、双关语、外来语，非常用句读，弄得复杂艰深、晦涩难懂。荒诞派戏剧常常有意抽掉语言的意义，大量使用陈词滥调，胡言乱语，让人物不断说一些颠三倒四、支离破碎、重复啰唆、文不对题、词不达意、莫名其妙、自相矛盾的梦呓和废话，以此来表现人的无聊、空虚、隔膜、荒诞。新小说派认为，传统小说的语言已经“僵化”、“陈腐”，小说要能经得起电影和电视的竞争，必须寻求小说独特的创作途径和特有的表现方式。根据小说自身的特点，首先必须在语言文字上下功夫。他们强调新小说应着重于文字的变化，试验“文字历险”，成为“文字写作运动”。他们极其注意研究重叠、对称、隐喻、类比、转移、节奏、谐音、人称变化等技巧，使语言多变，富有特色。黑色幽默公开宣称要“给秩序以混乱”，一反传统小说的清楚明晰、合乎逻

辑，而代之以颠倒错乱、稀奇古怪。

现代派文学作品的语言既有难度，又带有挑战意味，它对读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对批评家和理论家的要求也就更高了。因此，要研究 20 世纪西方文学，就不能忽视对文学作品语言的研究。随着文学实践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理论家认为，语言绝不是文学简单的物质外壳，而就是文学的直接“存在”，即文学就是语言组织的构成物或创造物。他们认为，是语言在构成或创造着文学，而不是先有文学而后要求语言使之物象化。正是这一种观点使文学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使得现代文学理论对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借鉴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四）文学理论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构成了其“语言学转向”的内在必然性

在西方文学理论史上，语言学和文学的关系一直是重大主题之一。文学是以语言符号为媒介的艺术，文学理论自然离不开对语言的研究。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语言修辞学的研究就是文艺理论家的重要课题。中世纪圣·奥古斯丁提出的“语象”理论，托马斯·阿奎那提出的语言的字面意义和象征意义的问题，文艺复兴时期但丁的“四义说”等等，对文学理论的发展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这一时期文学理论研究的重点仍然是文艺与其摹仿的对象——自然之间的关系，“艺术摹仿自然”是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理论家研究的核心问题。到了近代，文论家们更加重视对文学语言的研究。伏尔泰从语言入手研究各民族文学的独立性和差异性，莱辛提倡运用平实的日常生活语言取代新古典主义戏剧中华而不实的贵族语言，华兹华斯主张用真挚单纯的语言反映田园生活，福楼拜要求文学语言要具有“诗的韵律和科学语言般的精确性”等，都是突出的例子。但这一时期文艺理论研究的重点还不是语言，而是文学创作的主体——作家。人们普遍认为，任何一部伟大作品，只能由一个灵魂、一种独特的精神状态产生，这是一般的规律。因此，文学理论应着重探讨作家是如何创作出这样伟大的作品来的。20 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理论家对文学理论的这种研究范式感到不满。俄国





形式主义理论家雅各布森公开指责传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缺乏科学性。他认为，传统的文学研究把作家的个人生活、心理学、政治、哲学等等都无一例外地作为研究对象，这就好像一名警察，他要逮捕某个人，结果却把凡是在房间里的人、甚至从旁边街上走过的人都抓了起来。实质上，这种研究并不是文学研究，而是哲学、心理学、文化史等等的研究，只不过是把文学现象作为不完善的二流材料而已。因此，一门真正可以称之为“科学”的研究，不但必须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而且必须研究这一对象的独特之处，即这一对象与其他对象相比较而得出的独特性。因此，文学研究的对象不是笼统的“文学”或“文学作品”，而是“文学性”，也就是文学之为文学的本质特征。而“文学性”就存在于文学作品的语言之中。这种观点可以说代表了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发展的潮流。人们普遍感到，文学理论对它本应重视的研究核心——文学作品（文本），忽视得实在太久了。要使文学理论成为一门科学，必须重视对作品本身，特别是对作品语言的研究。

二、“语言学转向”的具体表现

“语言学转向”作为20世纪西方文论的一种范式转型和发展趋向，在具体的理论流派中又有着不同的表现。

在20世纪西方文论中，与“语言学转向”相关的最早命题，是意大利美学家和文学理论家克罗齐提出的“美学与语言学的统一”。这一命题在当时造成了振聋发聩的效果，对20世纪西方文论“语言学转向”，起到了最初的理论激发与促进作用。可以说，他在西方文论史上比较早地设想了从语言学角度来研究艺术，因此，我们不妨把他的理论看做是20世纪西方文论的“语言学转向”的最早呼声。象征主义理论家们紧随其后，他们认为文学艺术是彼岸理想的象征，因此，文学的本质就在于文学语言的象征性。波德莱尔把诗歌称为“暗示的魔法”，指出诗歌语言的不确指性和多义生成性；马拉梅为寻求一种纯粹的诗的语言而倾注了毕生心血；瓦莱里认为，纯诗要努力传达的是一种不可言喻而又永恒不变的情感效



果；纯诗本身是一种延续的行为，不可能真正完成，也不可能有意向上的确指性；朦胧应该是纯诗的属性，明晰、易于理解则与诗歌格格不入。象征主义理论对后来海德格尔、罗兰·巴特等人的理论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以卡西尔、苏珊·朗格等人为代表的文学符号学，从人、文化的本质入手研究文学的本质，由人的本质生发开去，研究人类文化的各个方面，并把这些方面看成是人的本质展开的一个有机体。他们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来取代传统的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而文艺，在他们看来，就是表现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他们把艺术看做独立的符号系统，在揭示艺术语言和科学语言、日常语言的差异中，为艺术符号或诗的语言寻找自律的理由，寻找自身合法化的依据。后来，这成为20世纪西方文论的一种普遍的倾向。

俄国形式主义文论是从批判传统文学理论缺乏科学性开始他们的理论研究的。为了使文学理论摆脱过去的框框，真正成为一门科学，这派理论家努力把他们的理论建立在文学独具的特性上。雅各布森提出，文学研究的对象不是笼统的文学，而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东西——即“文学性”。而“文学性”就存在于文学作品的语言中。英美“新批评”认为，作者意图往往和作品实际有矛盾，因此，以作者的意图为标准去分析作品，只能陷入“意图谬见”；同样，读者对作品的感受与作品本身也往往是存在着矛盾的，因此，以读者的感受为标准去分析作品就会导致“感受谬见”。因此，真正科学的文学批评只能是以“文本”本身为出发点和研究中心。直到20世纪60年代结构主义文论兴起之前，“新批评”都一直是英美文论的主流和正统，他们对文学作品条分缕析的“细读”取得了出色的成果。

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是20世纪西方文论“语言学转向”的语言学基础，而结构主义文论则是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关系最为密切的文学理论，它的许多极为重要的概念和思想都直接来自结构主义语言学。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套用索绪尔语言学的理论模式，把具体作品看成文学的“言语”，力图透过它去探索文学作品



的“语言”（具有普遍意义的模式）。于是作品不再是中心，作品之间的界限被打破，批评家的兴趣转移到作品与作品之间的关系以及同类型作品的共同规律。结构主义文论在叙述体文学研究中成绩尤为显著。普罗普研究童话，列维-斯特劳斯研究神话，都为结构主义文论奠定了基础。结构主义文论家都把语言学的模式应用于文学，去研究文学的规律，甚至直接说文学的“语法”。在格雷马斯和托多洛夫等人的著作里，故事里的人物情节和各种描写成了名词、动词和形容词，整部作品仿佛一个放大的语句，其组织结构完全遵循文学语法的规则。从某种意义上说，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目的，就在于要揭示文学结构与语言结构的相似性，从而对文学及文学作品具有普遍性的语言特性及语言功能做出描述。严格地说，仅仅重视文学语言、研究文学语言只是“语言的转向”，只有自觉地以语言学作为一种研究范式来研究文学才算得上是“语言学转向”。结构主义文论是第一种自觉地以一种成熟的语言学理论为指导来进行文学研究的理论模式，因而在“语言学转向”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解构主义是在对结构主义文论的批判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对于结构主义既有颠覆也有继承。实际上，只要我们承认语言的结构性，承认能指与所指之间关系的任意性，承认语言符号的意义来自符号之间的差异，那么，按照这一逻辑，阐释一个语言符号序列的意义，即寻求与能指符号相对应的所指含义的过程，从理论上说，便只能是一个以新的能指符号去取代有待阐释的能指符号的过程，一个由一种“能指”滑入另一种“能指”的永无休止的倒退的过程。也就是说，既然意义来自于差异，那么，意义就将永远被延宕，永远不能达到。语言符号系统本身就不是一个规定明确、界限清楚的稳固结构，而是更像一个无限展开的“蛛网”，这张“蛛网”的各个网结都相互联结、相互牵制、相互影响且不断变动游移，做着不断的循环和交换。因此，无论写作还是言语，都是一种自由的嬉戏。写作（包括言语）并不是把一种既有的观念表达出来，而是投入语言的自由嬉戏之中。阅读的目的也应当是和写作一样，投入



符号的自由嬉戏之中，并满足于自由嬉戏。在这种理论指导下，解构主义在文学批评实践中注重探求文本的自我颠覆，文本与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强调“误读”在阅读和批评中的意义，从而得出了一系列具有革命性见解。

存在主义以存在论的语言论把20世纪西方文论的“语言学转向”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在对语言的认识上，人们通常认为，先有一个外在于我们的客观世界存在，语言只是人们用来指称这一客观世界的符号体系，其目的是为了交流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发现客观世界的规律。但在存在主义看来，这种语言是非本真的语言，是语言的异化。本真的语言不是媒介，而是理解，它是人与世界打交道方式，是存在之家，它与人的本真存在紧密相关。在此基础上，存在主义也更新了对艺术与现实之间关系的认识。人们通常认为，现实生活是真实的，艺术则是运用艺术语言（包括文学语言，也包括音乐语言、舞蹈语言、绘画语言等等）对现实的反映。但在存在主义看来，现实的日常生活所构成的常人世界恰恰是不真实的，它是人的非本真的存在；只有在艺术中，人才找到了自己的本真存在。艺术引导人们进入本真的存在，而一旦人们真的进入了这种存在状态，艺术与现实也就融合为一体了。

通过以上的简略叙述不难发现，“语言学转向”在不同的理论流派中尽管有不同的表现，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它们共同的“语言本体论”倾向。也就是说，进入20世纪以后，人们不再把语言看成是传达文学作品内容的工具，而是把语言看做是文学的直接存在。在他们看来，是语言构造和构成了文学，研究文学就是研究文学语言。有些文学理论流派（如结构主义）甚至认为，文学的本质和语言的本质是相同的，语言学理论就是文学研究的基本范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学转向”并不仅仅意味着关注文学作品的语言，也不仅仅意味着借鉴语言学的理论、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语言本体论”对“语言工具论”的取代，这是文学理论史上的一次翻天覆地的革命。